畅销书的生产:建阳余氏书坊与晚明“纲鉴”的流行

李　卉

内容摘要:晚明在《少微通鉴节要》与七家注《资治通鉴纲目》的基础上诞生出一系列历史学习参考书,因书名中往往有“纲鉴”二字,常被如此统称。这些书服务于科举,因传播广泛而产生过巨大的文化影响。“纲鉴”在万历中后期开始流行,建阳余氏书坊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先流行起来的是余氏自新斋推出的“标题论策纲鉴”,针对科举考试,篇幅短小。随后余象斗双峰堂、三台馆出版“历史大方纲鉴”,广收史评,标榜“名公”“集大成”。余氏萃庆堂则与文人合作,出版具有个人特色的“世史类编”。建阳余氏出版、经营“纲鉴”的例子,体现了书坊经营策略对书籍文献特征的塑造作用,正是由于市场的驱动,造就了商业出版书籍在主题、性质上的“似而不同”。

关键词:纲鉴　建阳余氏书坊　商业出版

引言

在晚明繁荣的书籍市场中,诞生了一类极为火爆的历史参考书,它们往往以“纲鉴”为名(故本文将这些书籍统称为“纲鉴”)——意指取材于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两部经典著作;书前附有潘荣《通鉴总论》、国统相承图、历代国号歌等辅助性资料,正文加入大量评语,有的还在眉栏增入注文、策题。这些“纲鉴”虽然形式与属性大致相同,但内容并不一样,体量从二十卷到近百卷不等;即便是明显有承袭关系的书,也往往有细节上的不同。“纲鉴”是一种实用性书籍,面向的群体主要是科举考生。因此,虽然这类书并不被珍视收藏,仍有大量保存至今,可见当时“纲鉴”之多。

甚至直到清末、民国间,“纲鉴”仍是流行的学习参考书,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吕思勉诸人幼年都是以“纲鉴”作为史学入门的①。不仅如此,“纲鉴”还是诸多历史小说的主要素材,是首批被翻译为满文的史书,是日本江户至明治时代最通行的中国通史,也是18世纪欧洲翻译中国史作品最重要的参考资料②。可以说,“纲鉴”类书籍在晚明以来的数百年中有着十分广泛的文化影响。

尽管如此,“纲鉴”因内容浅显,又服务于举业考试,在上层精英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评价较低,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俗书。现代研究者虽从史学普及的角度注意到“纲鉴”的价值③,但由于这类书大多为质量不佳的坊刻书籍,文献情况又极为复杂,多数研究仅停留于宏观叙述。最早对“纲鉴”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是王重民,他在编写《中国善本书提要》时经眼多种“纲鉴”,有较为细致的叙述,并总结其发展规律:“此类《纲鉴》之纂修,评注方面,在嘉靖、万历期间,由简而繁,万历末年达于顶点。天启、崇

①康有为“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既孤三月,遂从先祖于连州官舍。连州公日夜摩导以先儒高义、文学条理。始览《纲鉴》而知古今”(康有为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我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梁启超“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胡适说:“这件事我记不清在那一年了,大概在十一岁时。这时候,我已能够自己看古文书了。禹臣先生教我看《纲鉴易知录》,后来又教我改看《御批通鉴辑览》。‘易知录’有句读,故我不觉吃力。‘通鉴辑览’须我自己用朱笔点读,故读的很迟缓。”(胡适:《胡适:四十自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0页)吕思勉说:“我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我自能读书颇早,这一年,先母程夫人始取《纲鉴正史约编》,为我讲解,先母无暇时,先姊颂宜(讳永萱),亦曾为我讲解过。约讲至楚汉之际。我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日读数页。约读至唐初,而从同邑魏少泉先生(景征)读书。先生命我点读《纲鉴易知录》,《约编》就没有再看下去。”(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自述》,泰山出版社,2022年,第22页)按,《纲鉴易知录》是清代文人在晚明“纲鉴”基础上重新编辑加工的产物,属于本文定义的“纲鉴”类书籍。

②[比利时]钟鸣旦著,代国庆译:《明末清初的通史著述——纲鉴体史著谱系》,《世界汉学》第1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90页。

③如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8—409页;乔志忠:《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94—414页;左桂秋:《科举功能下的史学普及:析明代纲鉴史书》,《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42—45页。

祯又由繁趋简。”①王重民对“纲鉴”的认识长久以来作为权威观点被研究者引述。相比国内的关注寥寥,域外学者对“纲鉴”的研究有较大推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中砂明德与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中砂明德对《资治通鉴》系列衍生书做过系统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更明确地指出,“纲鉴”的上源是《少微通鉴节要》(以下简称“《节要》”)及《节要续编》和七家注《纲目》,特征是评语众多,类似“评林”②,并以《大方纲鉴》《玉堂鉴纲》为个案进行深入研究。此外,中砂明德还指出,福建出版人对“纲鉴”的编纂形成了“从开天辟地到近代的编年体史书”,“在一个书名之下编成了中国通史,使之得以普及”③,有史学史上的意义。钟鸣旦从中西方历史学交流的角度注意到“纲鉴”,调查了数十种版本,试图在其间梳理出谱系,并将之置于通史著述的发展中予以论述④,他是目前在“纲鉴”研究上掌握最多材料的学者,尽管梳理出的谱系仍存在问题,但其研究无疑推进了对“纲鉴”的宏观认识。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纲鉴”的基本情况已有一定共识,但其中仍存在一些含混不清的地方,如“纲鉴”的概念、类型与谱系等,有待进一步总结与补充。此外,“纲鉴”脱胎于《节要》(及其续编)和七家注《纲目》的坊本,是再度加工的产物,可以说,“纲鉴”的许多特征都与书坊运作脱不开关系。建阳余氏是晚明知名的刻书家族之一,其族人以敏锐的市场嗅觉较早开展“纲鉴”的编刊,制造了多种广为流行的书籍,是晚明“纲鉴”出版潮流的带动者。尽管有不少学者关注过建阳余氏家族及其刻书活动⑤,但尚未深入探究其与“纲鉴”类书籍编刊的关系。本文以余氏自

---

①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

②[日]中砂明德著,吴淑敏译:《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士大夫与出版人》,福建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387、390页。

③[日]中砂明德著,吴淑敏译:《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士大夫与出版人》,第462页。

④[比利时]钟鸣旦著,代国庆译:《明末清初的通史著述——纲鉴体史著谱系》,《世界汉学》第15卷,第37—90页。

⑤如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上)》,《文献》1984年第3期,第230—247页;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中)》,《文献》1984年第4期,第195—219页;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下)》,《文献》1985年第1期,第236—250页;[日]上原究一:《萃慶堂の歴代主人について:建陽余氏刻書活動研究(1)　附『書林余氏重修宗譜』「書坊文興公派下世系」第37世までの翻刻と校訂》,《中国古典小説研究》第19号(2015年),第21—54页;[日]上原究一:《自新齋系統について:(转下页)

新斋、双峰堂、萃庆堂的“纲鉴”出版为线索，梳理晚明“纲鉴”类书籍的发展，揭示建阳余氏书坊对“纲鉴”类书籍市场的引领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商业出版中书坊运作对书籍特点带来的影响。

一、“纲鉴”与建阳余氏书坊

晚明，《节要》在坊间被不断加工，增入七家注《纲目》的内容而产生了一类书籍，这类书籍在标题中常使用“纲鉴”一词，在取材对象、辅助资料选择、内容安排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因而往往被统称为“纲鉴”。然而其中也存在一定复杂情况：一些书坊为标新立异，虽然也出版具有“纲鉴”特点的书籍，但在书名上颠倒或避开“纲鉴”二字，如《玉堂鉴纲》《世史类编》；还有一些书坊将他书如《历朝捷录》稍作改编，虽与一般“纲鉴”大异，却冠名“纲鉴”，以图畅销。这些情况的存在，使研究者在讨论“纲鉴”“纲鉴体”时，关注对象有时并不相同，如中砂明德的研究重实不重名，只讨论真正意义上的“纲鉴”与“纲鉴体”；而钟鸣旦则将书名中带有“纲鉴”的书都纳入讨论，从而影响了其对“纲鉴”类书籍的分析，设置了“第三种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亚型”，指出“这些文本的风格与此前两种亚型迥乎不同，并且不可能在它们中间重建某一谱系”①。标准上的含混不利于建立共识，容易干扰研究深入，因而在讨论“纲鉴”相关问题之前，有必要对“纲鉴”概念稍作定义。笔者以为，“纲鉴”在坊间形成发展过程中，已在取材对象、辅助资料选择、内容安排等方面形成特色，故宜立足于此特色对其加以定义——所谓“纲鉴”，是内容主要基于《节要》

（接上页）建陽余氏刻書活動研究（2）》，《山梨大学国語・国文と国語教育》第 21 号（2016 年），第 110—122 页；周羿呈：《余象斗之后：余应虬与晚明建阳出版策略的转变》，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马孟晶指导），2018 年，第 23—91 页；潘建国：《明代公案小说的文本抽毁与版本流播——以余象斗〈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为例》，《文学遗产》2020 年第 4 期，第 139—152 页；程国赋、张宏：《明代萃庆堂刊刻“故事白眉”系列书籍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第 12—23 页；方彦寿：《增订建阳刻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321—344 页；余贤伟：《建安余氏刻书考略》，《印刷文化（中英文）》2021 年第 1 期，第 103—112 页；涂秀虹：《余象斗及余氏书坊之于公案小说类型发展的意义》，《文学遗产》2023 年第 6 期，第 91—102 页。

①［比利时］钟鸣旦著，代国庆译：《明末清初的通史著述——纲鉴体史著谱系》，《世界汉学》第 15 卷，第 49 页。

(及其续编)与七家注《纲目》,书前附载诸多辅助学习的工具性图表,书中增入大量名人史评的一类历史学习参考书;具有此类特色的书籍为"纲鉴体"书籍。而内容并非基于《节要》(及其续编)与七家注《纲目》,并不具有"纲鉴体"特征的书籍,即便书名含有"纲鉴"二字,亦非"纲鉴"之属。鉴于这些附会之书也是"纲鉴"影响下的产物,如果言及,可别立"泛纲鉴"的概念,将之容纳进去。

"纲鉴"并非一般文人著作,也没有明确的作者、稳定的内容,而是诞生于坊间的历史学习参考书,在不同书坊的袭用、加工与改编中形成了大量相似而不同的书籍。因书籍间关系复杂,"纲鉴"的类型与谱系问题也引起学者关注。根据纲目体与编年体的结合情况,上田望将"纲鉴"分为以《节要》为基础的"节要型纲鉴"和以《纲目》为基础的"纲目型纲鉴"①;钟鸣旦则将"纲鉴"分为三种亚型,但由于第三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纲鉴",实际上也是两种:一种为"纪传体风格",强调其偏离了《通鉴》编年传统;一种为"编年体风格",指"承续的是宋明时期《春秋》—《左传》形式的编年通鉴传统,按照编年风格的通鉴来编排:简短正文(寥寥数语),附之以简要的注疏"②。钟鸣旦所说的前者偏离编年传统的特点,实际上是由于这类书籍以《节要》为主体造成的,经常跳跃年代、突破编年史框架正是《节要》的风格③;而后者的"《春秋》—《左传》形式"和"简短正文(寥寥数语),附之以简要的注疏",正接近于《纲目》的特征,这两种亚型分别对应上田望所言的"节要型纲鉴"和"纲目型纲鉴"。此外,两人均指出第一种类型的"纲鉴"(即"节要型纲鉴"或有"纪传体风格"的纲鉴)占绝大多数。这种类型的划分是较为成功的,但钟鸣旦尝试进一步在"纲鉴"中建立谱系,实际上难以实现。这些坊间畅销的学习参考书,内容成分往往极其复杂,既有从其他畅销书继承的部分,又有当下编者的改动,不同种类的"纲鉴"可以说都是这样层累叠加的产物,版刻时间并不能代表某种内容产生的先后。在内容特点与版刻时间均不能作

①[日]上田望:《講史小説と歴史書(1):『三国演义』、『隋唐両朝史伝』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30册(1996年),第111—112页。

②[比利时]钟鸣旦著,代国庆译:《明末清初的通史著述——纲鉴体史著谱系》,《世界汉学》第15卷,第48页。

③关于《节要》风格问题,详参[日]中砂明德著,吴淑敏译:《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士大夫与出版人》,第381—382页。

为依据的情况下,很难仅仅通过文本特征厘清“纲鉴”的谱系。故对于这类商业出版书籍的文献学问题,唯有回归其出版语境,探索书籍衍生发展的规律后,才能得出可靠结论。

“纲鉴”是何时诞生的?这个问题难以有确切答案,目前能追溯到的最早的“纲鉴”,是一部名为“纲鉴大成”的作品。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凡例称:“《纲》《鉴》二书,古未有合编者,合之者自荆川唐老师始。”①钱茂伟、中砂明德等学者均推测所谓“合之者自荆川唐老师始”者可能是指托名唐顺之的《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②,出版于隆庆、万历时期③。此外,中砂明德还注意到一则材料,即《新刻世史类编》中的彭好古识语——“于是魏献〔显〕国辑自羲、轩至元末,而诸名家因稍删订为《纲鉴大成》”,并提出“诸名家”实际上指书坊雇佣的文士④。此处可兹补充的一条材料是万历间司马晰所编《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谈及司马光籍贯时提到了该书:“奈何近世学者考核不详,著述多谬,如贵溪樵云徐君庭桂,假名荆州唐公,著《纲鉴大成》,以公为洛阳人,而仍存涑水之号,不知涑水之源出于绛县,而经流于夏之西境,故当时称公为涑水先生者以此,洛阳安得有涑水

①《凡例》,《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卷首,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索书号:リ08 00744),叶十四。

②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第405页。[日]中砂明德著,吴淑敏译:《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士大夫与出版人》,第402—403页。

③《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有“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四十六卷”,明隆庆书林归仁斋杨员寿刻本,藏地为山西省图书馆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查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明善本目录”中有“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七十卷”(索书号:610.29/0023),为明万历六年(1578)刊本,与《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不符。笔者未见两本,暂依著录认定其为隆庆、万历间刊本。

④[日]中砂明德著,吴淑敏译:《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士大夫与出版人》,第403—404页。中砂明德因未见魏显国书,持怀疑态度:“关于魏献(显)国,李槃序文中也有其姓名,曾编纂自盘古到元末、达数百卷的《历代史书大全纲目》,今不存。魏氏是否真编有这样的书,也值得怀疑。”实际上,确有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一书,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索书号:史040-0001),不过此书为纪传体,与《纲鉴大成》差距较大。即使《纲鉴大成》编纂曾利用《历代史书大全》,应该也仅是一定程度的参考。

也?”①司马晰为当世之人,且言之凿凿,应有一定可信度。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徐庭桂,应该是与书坊合作的下层文人。

《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与《新刻世史类编》均由建阳余氏家族书坊出版,之所以强调《纲鉴大成》的重要意义,可能因为该书是余氏炮制“纲鉴”的重要参考,实际目的是凸显自家出版的“纲鉴”渊源正统。《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的存在说明在隆万之际已经出现了“纲鉴”这种新型参考书,不过在当时似乎尚未形成风潮。笔者根据《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各大图书馆检索目录统计了出版于明万历间且有具体版刻时间②的“纲鉴”,详见表1:

表1　明万历间有具体版刻时间的“纲鉴”版本情况③

序号	书名卷数	署名	版本	藏地
1	新刊史学备要纲鉴会编四十八卷新刊史学备要史纲统会二十三卷	王锡爵辑,黄凤翔编	明万历六年(1578)郑以厚刻本	辽宁省图书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2	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二十卷首一卷	余有丁辑,申时行补遗	明万历十四年(1586)自新斋余良木刻本	安庆市图书馆
3	镌王凤洲先生会纂纲鉴历朝正史全编二十三卷	王世贞撰	明万历十八年(1590)萃庆堂余泗泉刻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①司马晰编:《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卷七,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万历十五年(1587)司马祉刊万历末年增补本(索书号:205.24 02693),叶二十二。

②亦有出版于万历间但无具体年份的“纲鉴”,如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余氏衍庆堂刊本《新锲太仓王卫增修名贤定论纲鉴实录》二十卷(索书号:284-0085)、贵州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七十卷首一卷(索书号:2975)等,因对下文讨论“纲鉴”具体兴起时间帮助不大,故略去。

③表中序号1和3的版本信息来自《中国古籍总目》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似乎为两部书合订本,笔者未见,不知“新刊史学备要纲鉴会编四十八卷”是否属于“纲鉴”,以及著录时间是否属于该书,暂列于此;3已被《四库禁毁丛书》影印,书中并无版刻时间,《四库禁毁丛书》也仅标为“明刻本”,其“万历十八年”的版刻时间存疑,此书内容自宋朝开始,与“历朝正史全编”的书名不符,疑为某种“纲鉴”的残本,因此书问题较多,本文暂不展开讨论。

续表

序号	书名卷数	署名	版本	藏地
4	新刊补遗标题论策纲鉴全备精要(新锲郭苏二文宗参订纲鉴汇约大成)二十卷①	郭子章校阅,苏濬精选,杨天清补辑	明万历二十年(1592)余良史(秀峰)刻本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5	新锲国朝三元品节标题纲鉴大观纂要二十卷	焦竑辑,苏濬删补,李廷机校正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集义堂黄氏乐吾书轩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
6	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二十卷②	余有丁删辑,申时行补遗,王锡爵考正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自新斋余氏刻本	安徽省博物馆,南京图书馆
7	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三十九卷首一卷	李廷机编纂,申时行校正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闽建邑双峰堂余象斗刻本	浙江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美国国会图书馆等
8	鼎锲叶太史汇纂玉堂鉴纲七十二卷	李京订义,刘朝咸精校,叶向高汇纂	明万历三十年(1602)书林熊体忠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

①京都大学本前23叶为抄补。第一卷卷端(抄补)署“新锲郭苏二文宗参订纲鉴汇约大成总论首卷”,卷末署“补遗标题论策纲鉴全备精要一卷终”;第二卷卷端署“新刻补遗标题论策纲鉴全备汇约卷之二”,卷末署“补遗标题论策纲鉴精要二卷终”。尊经阁文库著录为“新锲郭苏二文宗参订纲鉴汇约大成二十卷”,宫内厅书陵部著录为“纲鉴全备汇约(补遗标题论策·20卷)”。中砂明德曾指出,前田尊经阁文库藏《新锲郭苏二文宗参订纲鉴汇约大成》与京大本版本相同([日]中砂明德著,吴淑敏译:《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士大夫与出版人》,第394页)。

②《中国古籍总目》著录该书为三十卷(《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435页),误。笔者至南京图书馆查阅,实为二十卷。

续表

序号	书名卷数	署名	版本	藏地
9	鼎锲纂补标题论表策纲鉴正要精抄二十卷	冯琦撰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书林联辉堂郑纯镐刻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
10	新刻世史类编四十五卷首一卷	李纯卿草创,谢迁补遗,王守仁覆详,王世贞会纂,李槃增修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萃庆堂余彰德刻本	中山大学图书馆等
11	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三十九卷首一卷	袁黄编纂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双峰堂余象斗刻本	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
12	新刻紫溪苏先生删补纲鉴论策题旨纪要二十卷	苏濬删补,李廷机校正,黄凤翔同校	明万历四十年(1612)集义堂黄氏刻本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13	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旨南纲鉴二十卷首一卷	苏濬编,李廷机纂,叶向高校	明万历四十年(1612)种德堂熊冲宇刻本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14	纲鉴要编二十四卷	陈臣忠辑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	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整体来看,万历前期“纲鉴”数量较少,大部分是在中后期出版的,说明“纲鉴”在市场上形成风潮是在万历中后期。从版刻信息看,万历间“纲鉴”几乎都出自建阳书坊。一直以来,建阳在《通鉴》《纲目》相关书籍的刊刻上占据重要地位,自宋至明出版了大量注解、增补、考释、节略、简化书籍,是《通鉴》相关书籍发展与衍生的主阵地①。“纲鉴”早期主要由建阳书坊刊刻出版,在建阳书坊间流行也是势所必然。而在建阳书坊所刊

①建阳书坊大量刊刻《通鉴》《纲目》相关书籍,与建阳作为出版中心的地位、朱子与闽学在当地的文化影响、二书与科举备考的关系等因素有关。关于建阳书坊《通鉴》类书籍的刊刻,详参涂秀虹:《明代“按鉴”演义与建阳刻书背景》,《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第23—28页;涂秀虹:《“按鉴”:明代历史演义的编撰方式及其意义——从建阳书坊刊刻通鉴类图书谈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9—77页。

“纲鉴”中,一半为建阳余氏书坊所刊(表 1 第 2、3、4、6、7、10、11 种)。由此可见,建阳余氏不仅较早开始刊刻“纲鉴”,且刊刻数量、种类较多,在早期“纲鉴”出版中占有显要的地位。接下来,本文将逐一探讨建阳余氏自新斋、双峰堂、萃庆堂几家书坊的“纲鉴”生产。

二、科举宝典:余氏自新斋与“标题论策纲鉴”

自新斋与双峰堂、萃庆堂等书坊同属建阳余氏家族,书坊主间有较近的血缘关系。根据现存刻本可知,自新斋在嘉靖至崇祯间均有刻书,署名者有余允锡、余良木(字绍崖)、余良相(字明吾)、余文杰(字泰恒)等①。在“纲鉴”广泛流行之前,经过刘剡改编与增补的《节要》是最为知名的历史学习参考书,该书在坊间又陆续被加工删改,冠以“翰林”“宪台”之名②,自新斋余允锡嘉靖二十八年刊《新刊宪台考正纲目批点音释资治通鉴大成》即是其中之一,也是现存较早的一种③。或许正是因为自新斋关注这类历史学习参考书的市场动向,故而率先刊刻推出了针对科举考试的“标题论策纲鉴”,上节表 1 第 2、4、5、6、9、12、13 种,均属此类。此外,明末尚有两种存世,分别为《重订苏紫溪先生会纂标题历朝纲鉴纪要》④及《新镌张太史注释标题纲鉴白眉》⑤。

这种“标题论策纲鉴”很明显是从坊刻《节要》改编而来,前有历代帝

---

①[日]上原究一:《自新齋系統について:建陽余氏刻書活動研究(2)》,《山梨大学国語・国文と国語教育》第 21 号(2016 年),第 110—12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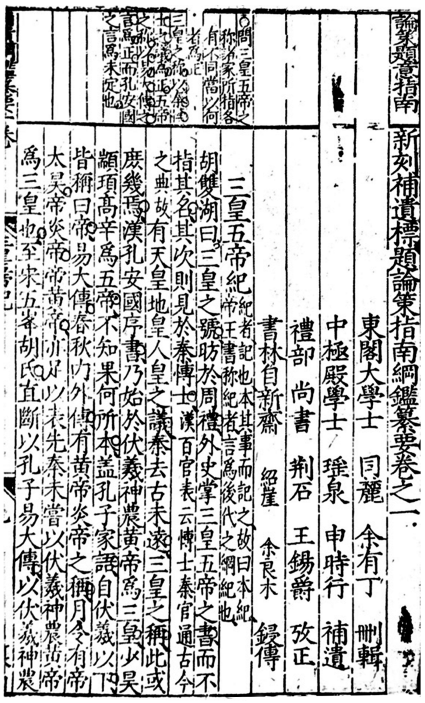
②[日]中砂明德著,吴淑敏译:《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士大夫与出版人》,第 402 页。

③今存《新刊宪台考正纲目批点音释资治通鉴大成》二十一卷,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书林余允锡自新斋刻本,《中国古籍珍本丛刊・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卷》第 33—36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据之影印。按,此本内容仅有宋元部分。

④《重订苏紫溪先生会纂标题历朝纲鉴纪要》二十卷首一卷,苏濬纂辑,张星鉴裁,朱起蛟、张吉士点定,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间刻本(索书号:线普 508509-16),存卷一至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52—53 册(北京出版社,1998 年)据之影印。按,该书内容至宋英宗。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部《新锲紫溪先生删补纲鉴论策题旨纪要》,《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为“明刻本”,存卷十七至二十(《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 127 页),卷数恰与前者接续。此类书籍卷端题名时有变动,疑两书可合为一部全本。

⑤《新镌张太史注释标题纲鉴白眉》二十一卷首一卷,张鼐辑,周宗建、曾楚卿参订,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末李潮刊本(索书号:rb2470),《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52 册据之影印。

王传授图与潘荣总论，正文涵盖三皇五帝至五代，虽然都为二十卷，但内容上进一步精简，同时加入《纲目》内容，如以“《纲目》断云”起首插入论断等。其最大的特色在于采用两节版（见图 1①），下栏为史文，上栏载录对应的论策题目及答题要点②，服务举子学习备考。尽管坊刻书名多不固定，但往往会突出书籍卖点，“标题论策纲鉴”的书名中就常见“纂要”“汇约”“精要”“正要”“纪要”与“标题”“论策”等字眼。


新刻補遺標題論策指南綱鑑纂要卷之一

東閣大學士　同麓　余有丁　刪輯

中極殿學士　瑯泉　申時行　補遺

禮部　尚書　荊石　王錫爵　攷正

書林自新齋　紹崖　余良木　鋟傳

三皇五帝紀

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爲後代之綱紀也

胡雙湖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傳博士漢百官表云博士秦官通古今之典故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外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以吳顓頊高辛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少昊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劉牧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


新刻補遺標題論策指南綱鑑纂要三十卷終

萬曆丙戌年孟夏月

余氏自新齋紹崖梓

大明豈不名符其實也哉

图 1　　图 2

在现存“标题论策纲鉴”版本中，最早的是自新斋刻《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卷首署“书林自新斋绍崖余良木锓传”（见图 1），书末有莲花牌记“万历丙戌年孟夏月余氏自新斋绍崖梓”（见图 2③）；其中

①《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卷一，影印明万历十四年（1586）余氏自新斋刻本，《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安庆市图书馆卷》第 7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年，第 367 页。

②嘉靖时已有总结《通鉴》《纲目》论策题的参考书，如郑氏宗文堂嘉靖三年（1524）刻《新刊通鉴纲目策论摘题》二十卷（安徽省图书馆藏，索书号：2：2448/2451），“标题论策纲鉴”上栏内容可能来自这一类参考书。

③《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卷二十，《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安庆市图书馆卷》第 10 册，第 510 页。

“绍崖余良木”字体偏小，疑似挖改，但“书林自新斋”并无改动痕迹，则书板有可能是余良木从家族中继承，挖改了姓名并加入牌记，实际刊刻时间或许更早于万历十四年（丙戌）。

其次是万历二十年余良史（号秀峰）刻《新刊补遗标题论策纲鉴全备精要》。余良史与余良进（号沧泉）等人曾以“怡庆堂”名号刻书，从名字来看，应与余良木是同辈兄弟①，可见其万历二十年所刻“标题论策纲鉴”应与自新斋关系紧密。相比于万历十四年本，万历二十年本除在书名与署名有所变动之外，在内容与行款上也稍有调整②，但整体来说只是一些细微的改动，基本保持了万历十四年本的面貌。万历二十七年，自新斋又再次出版了此书。

万历四十年种德堂刻本、崇祯刻本与万历二十年本文本相同，种德堂刻本内封面有熊冲宇识语称“今紫溪苏先生留意删补《纲鉴全备标题》，旨意精详，以为举业一助云”③，从标题来看，此《纲鉴全备标题》

---

①有关“怡庆堂”刻书情况，详参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7—258页。上原究一亦认为余良木与余良史、余良进有血缘关系，详参[日]上原究一：《自新齋系統について：建陽余氏刻書活動研究（2）》，《山梨大学国語・国文と国語教育》第21号（2016年），第118页。

②文本上的改动大多是精简，如卷一“帝喾高辛氏”万历十四年本传文结尾“帝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岁”后有“子挚嗣立，荒淫无度，不修善政，诸侯废之而尊尧为天子”一句（《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卷一，《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安庆市图书馆卷》第7册，第380—381页），万历二十年本删去；卷一“大禹”万历十四年本传文末尾胡双湖评语“不可忘也“后还有“然禹崩，启遂继，世以有天下，后世不传贤而传子，实自此始矣”一句（《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安庆市图书馆卷》第7册，第390页），万历二十年本删去；卷五“孝昭皇帝”万历十四年本中始元五年传文后胡致堂曰：“蒯聩，卫灵公世子也……然则谓《春秋》是辄者，考实未详而处义未精矣。又况与戾园之事非类乎……霍光不学，故莫能辩，然其言曰公卿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则格言也”一大段文字（《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安庆市图书馆卷》第8册，第164页），万历二十年本精简为“胡致堂曰：谓《春秋》是辄者，考实未详而处义未精矣。霍光不学，故莫能辩，然其言曰公卿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则格言也。”（《新刊补遗标题论策纲鉴全备精要》卷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明万历二十年[1592]余秀峰刊本，索书号：东方史-II-1-27，叶一）等等。行款上，万历十四年本下栏行格宽窄根据内容变化，万历二十年本下栏没有行格宽窄变化。

③《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旨南纲鉴》内封面，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年（1612）熊冲宇种德堂刻本（索书号：T/2512/4936）。

可能指的就是万历二十年的《新刊补遗标题论策纲鉴全备精要》。万历四十年集义堂刻本相比他本在正文与策题部分有些许不同，应经过一定编辑加工。明末李潮刊本《新镌张太史注释标题纲鉴白眉》则有明显加工痕迹，该书增补了若干评论，在正文上标记“纲”“鉴”字样以区别出处，并在最后增加了一卷“历代补遗”①。此外，北大所藏万历二十六年黄氏乐吾书轩刻本与万历三十四年书林联辉堂郑纯镐刻本，笔者尚未亲见。

可以发现，在“标题论策纲鉴”的出版中，自新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目前已知所有“标题论策纲鉴”中，最早的两个版本即为自新斋及其兄弟书坊刊刻，且数年后又再度出版；而其他书坊刻本出现较晚，亦未见同书坊屡次出版的情况，部分版本明显与自新斋万历二十年本有因袭关系，且都为二十卷。以现有信息推测，这种二十卷本“标题论策纲鉴”最有可能是由自新斋主导编辑的新参考书②。自新斋在嘉靖年间已开始关注历史参考书领域，刊刻冠以“宪台”之名的《节要》，随后在此基础上稍作创新，借助《纲目》改编并加入论策，形成这种新的服务举业的历史参考书。该书出版后反响较好，不仅自新斋及其兄弟书坊怡庆堂稍作修改翻刻，其他书坊也通过翻刻或增补加入出版行列。

相比此前四十六卷的“纲鉴大成”，仅有二十卷的“标题论策纲鉴”更为简明扼要，易于掌握；又整合入论策，更符合广大科举士人的需求。自新斋这种针对科举考试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标题论策纲鉴”的现存版本中，从万历十四年到万历四十年就有 7 个以上，可见此类参考书在当时

①李潮为金陵书坊主，坊号为“聚奎楼”，曾刊《诗通》《小窗清笺》《新镌刘云峤太史摘纂然然故事》等书。《新镌张太史注释标题纲鉴白眉》二十一卷可能是李潮在自新斋“纲鉴”流行后，在其基础上改头换面，出版于金陵的书籍。类似这样使用自新斋“纲鉴”进一步加工、出版于异地的书籍可能尚有很多，但因卷数、书名、署名变动以及出版信息的缺失，难以一一考察。

②尽管对于佚失严重、普遍雷同的坊本学习参考书而言，以现存版本判断二十卷本“标题论策纲鉴”出于自新斋主导编辑，确有证据不足之嫌；但“标题论策纲鉴”有诸多版本，则当时应颇为畅销，而按常理，自家书坊所编书籍若畅销，自然会积极再版、改编出新。若此书为其他书坊更早首刊，至少应与自新斋一样屡次出版，有数个版本。在同类型书籍存世概率大致相近的前提下，其他书坊的早期版本全部佚失而唯独自新斋保存下数个版本的概率较低。因此，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认为此书是自新斋主导编辑，是目前较为合理的推测。

的流行程度，并引发更多书坊加入“纲鉴”制造。

三、名家指引：余氏双峰堂“历史大方纲鉴”

建阳余氏家族中最有名的书坊莫过于双峰堂。“双峰”是余象斗父亲余孟和之号，用作刻书堂号，后为余象斗继承。在同族自新斋书坊的“标题论策纲鉴”取得不错的市场反响后，余象斗也加入了“纲鉴”的制作，在万历二十八年推出《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并在十年后修订增补为《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①。

这种“历史大方纲鉴”不再以科举论策题为卖点，而是借助古今名家树立权威，以“集大成者”“大方家”的面目吸引读者。万历二十八年，《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以“九我李太史编纂”“九我李先生辑著”的名义出版。李九我即李廷机，尽管万历二十八年时他尚未成为宰辅，但因“三试巍科”的好成绩，早已在书林中声名鹊起，频繁出现在各类举业书上②。作为科举的成功者与担任过史官的专业人士，李廷机编辑的“纲鉴”代表着权威、可靠，能够为读者提供正确的指引。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印象，《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极力凸显“名公”的规模。

首先是卷首部分，除了图谱、国号歌、总论等实用资料，还有长达八叶的“先儒名公姓氏”，以“籍贯或号（以墨围圈起）+某氏”的形式罗列了上

---

①《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卷端署“闽建邑书林余象斗刊行”（《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卷一，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索书号：2012402771，叶一）；《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署“谭阳余象斗刊行”，书前韩敬序曰：“闽建余君文台，慷慨豪侠，行义好施，夙与师有通盟谊，其二三伯仲郎，俱以文学名，而长君君及，屡试辄冠，翩翩闽中祭酒，束装千里，来购是书。”（《叙袁先生纲鉴补》，《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卷首，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明万历三十八年刻本，叶二至三）托名问题暂且不谈，序言揭示了余象斗为“大方纲鉴补”原始出版人。在余象斗本之前也未见与“大方纲鉴”相似度高的书籍。“大方纲鉴”为余象斗双峰堂制造推出应无疑义。

②建阳余氏刊刻了大量署名李廷机的书，余象斗更将其列为自己编著书的校者。有学者指出，建阳书坊主与李廷机之间也许并非单方面托名，而是有可能存在实际联系。详参［日］表野和江著，李卉译：《宰相的应试参考书：李廷机与举业书出版》，《南方学刊》2025年第2期，第10—27页。

自西汉下至明嘉靖时期的165位学者,并附小传。这颇为壮观的名录自然是为了借助耳熟能详的前贤增强可信度,向读者展现其书参考之广、采纳之博。不过细看名录会发现一些违和处,比如在众多被墨围圈起的籍贯和号之间出现了南宫靖一的姓氏、陈季雅的全名——显然是因为这两人仅有作品传世,身份信息不明。类似这样的人实在称不上"名公",但正是因为有类似的"充数"情况,才形成了足以震撼读者的规模。此外,卷首还有"读史要法",收录程子、朱子、吕东莱、苏东坡、胡致堂、李空同等人有关《通鉴》《纲目》读书方法的言论,用以指引读者阅读与学习。然而这里却存在张冠李戴,如"胡致堂曰"之下是吕祖谦的议论,"苏东坡曰"内容出自程颐的文章,显然,这样的移花接木也是为了避免重复,增加"名公"数量①。

关于书籍主体部分,序言称:"故以荆川氏曩所合并者稍加润色,栉其浮靡,题关后场者标之,字涉亥豕者厘之,庶纲举其凡例而大义昭,鉴悉其事词而大要备,则简而不漏,详而不秽,信哉其为大方家也,故名之曰大方者。"②"历史大方纲鉴"以"合并纲鉴大成"为基础③,除了序言提到的内容方面的加工,还在原有基础上增入更多史评,有时一段文字结束,又接连五六位"名公"议论,篇幅甚至超过原文。相比二十卷的"标题论策纲鉴",双峰堂"历史大方纲鉴"体量翻倍——正文加卷首共四十卷,不仅载录更多史事,叙述也更为详细。以"汉纪·孝元皇帝"初元间(前48—前44)的内容为例,《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在初元二年开头加入一段《纲目》文"下萧望之……皆免为庶人",并记叙了夏四月立皇太子事;对于弘恭、石显等人谋害萧望之之事,比二十卷本"标题论策纲鉴"更为详细地说明了几人的身份,并加入元帝不知"召致廷尉"为

①详参[日]中砂明德著,吴淑敏译:《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士大夫与出版人》,第412—414页。

②《刻历史大方纲鉴序》,《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卷首,叶十一。

③《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一书有若干民间藏本,可通过孔夫子旧书网的交易快照看到书影。比较《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与《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后者在历史文本上基本承袭前书,也有一定删减。《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上栏为内容提要;《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上栏既有提要,亦有评论、策题等,且其中的国名、地名、人名、时间,均有不同形式的墨围、旁线标识。

下狱的故事①。在注释方面,正文中插入更多名词解释,段后也更频繁引用《纲目》"七家注",评论方面更有大幅增补。如对"汉纪·孝元皇帝"初元间内容中"十一而税""外属""中人""刑人"等名词以双行夹注解释;在初元元年史文后引"发明",在初元二年后引"书法";并增入"常熟丁奉""张南轩""尹遂昌"等人评论②。

作为一部历史学习参考书,《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确实可以算是质量上乘,其内容丰富,以古今众多学者的史评穿插其间,附有注音、注释、策题,载录独立的图、谱、读书法,而且各部分内容井井有条,重点分明,清晰易览,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可见双峰堂不遗余力的标榜与宣传并非虚言。该书的出版无疑取得了成功,万历三十二年,余氏刊刻《节要》使用了几乎完全一样的标题,仅仅把"纲鉴"换成了"通鉴"③,显然是为延续这种热度;万历三十八年,双峰堂修订并刊刻"历史大方纲鉴",将"代言人"改成"了凡先生"袁黄;万历末年,余象斗又在此基础上增删,以"睡庵先生"汤宾尹名号推出了《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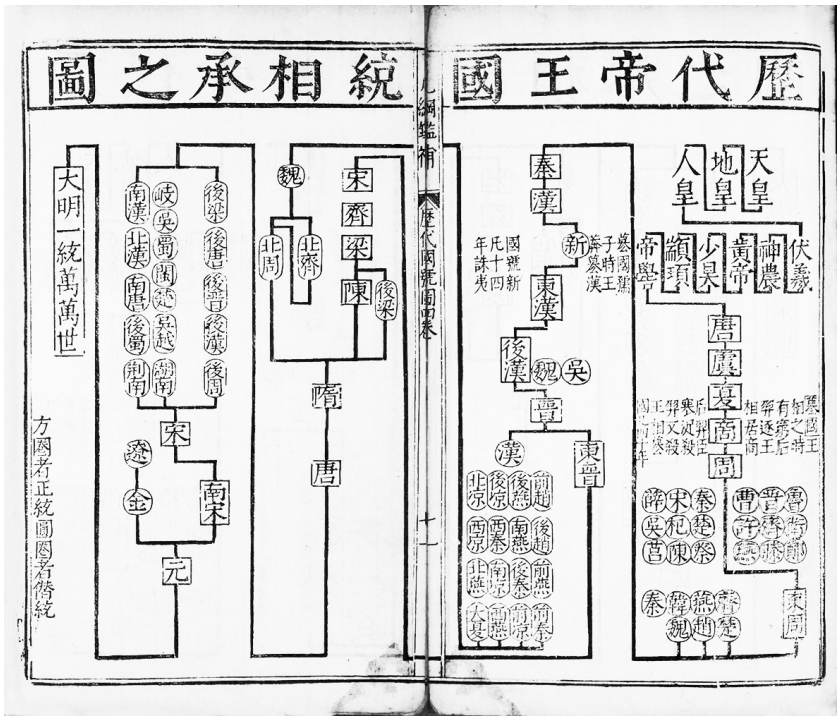
万历三十八年的《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并没有做太大的内容改动,但在一些细节处与表现形式上下了功夫,如卷首的"历代国号之图"变为"历代帝王国统相承之图"(见图3④),还以方圈、圆圈区别政权的正统与僭越,形式表现更为考究;正文中加入了阴文标记的"纪""编""纲""鉴",以区分文本来源,并对眉批有所增删,最重

①《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卷九,叶一至三。

②《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卷九,叶一至三。

③《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通鉴》四十一卷,日本广岛市立图书馆、宫城县图书馆有藏。王重民以此书为《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之翻刻,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称"余象斗自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十年之间,三刻是书,三次更换名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98页),实误,中砂明德已有辩证([日]中砂明德著,吴淑敏译:《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士大夫与出版人》,第401页)。按,《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通鉴》卷端署"闽建邑书林余氏刊行",书末署"万历甲辰孟春书林余氏仝梓",未明确署双峰堂名号,但该书书名、版式、字体样式均与《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十分相似,由双峰堂主导刊刻的可能性较大。

④《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卷首,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明万历三十八年刻本,叶十一。


歷代帝王國統相承之圖
大明一統萬萬世
方國者正統圖國者僭統
元
宋
南宋
遼
金
南漢
北漢
南唐
後蜀
荊南
岐
吳
閩
越
楚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北齊
北周
隋
唐
後梁
陳
梁
齊
周
秦
漢
新
東漢
後漢
魏
吳
晉
東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後燕
南燕
後秦
前涼
後涼
南涼
西秦
南涼
西涼
北涼
大夏
前秦
後秦
後燕
西燕
北燕
北魏
東魏
北齊
北周
隋
唐
天皇
地皇
人皇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魏
吳
蜀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宋
遼
金
元
南宋
東周
秦
韓
趙
魏
楚
燕
齊
秦
楚
燕
齊
韓
魏
趙

出的“纲鉴”①,或许是为了与“双峰堂”出版的书籍作区分,没有延续“历史大方纲鉴”的标题。尽管《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长达七十卷,对史文与评论多有增减,但从书前附载“历代国号歌”“先儒姓氏”“论读史法”、书中以阴文标记“纪”“编”“纲”“鉴”及眉栏附载的评语与策题中,能明显看出“历史大方纲鉴”的影子。该书以“全史”为名,标榜“睡庵先生”汤宾尹,也延续了“历史大方纲鉴”集大成、提供名家指引的特色。

可以看出,“历史大方纲鉴”虽然同样面向科举士人,但不再以应对考试为核心,而是利用古今“名家”的声望为书籍质量背书,附载大量学习资料,提供更为详细的史文,网罗更多“名公”评语,意图打造集大成的历史参考书,指引读者学习,形式上也更为考究。“历史大方纲鉴”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文化影响,尤其是《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远销日本,早在宽文三年(1663)就被翻刻并加入鹅饲信之的训点②,成为江户时代最流行的历史学习参考书,并推动“历史”一词进入日语。清末“历史”作为外来词从日本传回中国,才有了近代意义上“历史”的概念③。

---

①《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七十卷首一卷,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刻本(索书号:284-0088)。根据该书“先儒姓氏”中的明人信息可推知出版时间在万历末年。日本铃鹿市立图书馆所藏本有署“三台馆藏版”的内封及“三台馆主人”的识语,详参[日]井上進:《書林の眺望——伝統中国の書物世界》,平凡社,2006 年,第 200—207 页;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 98 页。

②《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三十九卷首一卷,笔者藏日本宽文三年(1663)京都野田庄右卫门刊本。

③“历史”一词并非常用语,晚明以前用例极少,晚明屡见于商业出版的历史学习参考书,如《历史一览》《历史分类人物通考》《历史大方纲鉴》等,其书名中的“历史”,均指“历代史书”。其中《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一书影响极大,是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容易入手、最易读的通史,该书的和刻本直至明治时期仍有出版。“歷史(れきし)”在 18 世纪前半叶已成为日语普通表达。日本接受西方文化时以“歷史”翻译“history”,语义有所改变,从日本传入的“历史”一词所指更接近西方“history”。详参[日]井上進:《本の話——書と本》,《書林の眺望——伝統中国の書物世界》,第 49—52 页;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90—494 页;蒋重跃主编:《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57 页。

四、儒师之作:余氏萃庆堂与“世史类编”

萃庆堂主人余彰德字以诚,号泗泉,其父余仲明与余象斗的父亲余孟和是亲兄弟,也就是说,萃庆堂与双峰堂的书坊主有极近的亲缘关系。余彰德之子余应良(字真如,号继泉)、余应虬(字犹龙,号陟瞻)也多用“萃庆堂”名号刻书①。余氏家族亦儒亦商,余应虬“髫龄补郡弟子员,试辄前矛。乡闱再蹶,因肄业南雍,文名噪白下……长子昌会,次昌年,俱以诸生入太学,季昌历。孙震,庠生,以中丞台荐授节推;晋,庠生;履,儒士,俱振振质有其文焉”②。余彰德虽为布衣,但也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重修同文书院,“泗泉既同少司马陈幼溪捐赀拓葺”③,为书院购置田产④。数十年后同文书院再度重修,也是萃庆堂子弟助成其事,并承担书院的经理事务⑤。余氏家族常与儒者文人往来,在生意上也会与他们合作,萃庆堂推出的“纲鉴”《新刻世史类编》即为与文人合作的产物,虽然它仍是以谋利为目的的商业性书籍,但也具有一定的个人色彩与思想性。

萃庆堂出版《新刻世史类编》的合作者是李槃,字用甫,号大兰,浙江

---

①详参[日]上原究一:《萃慶堂の歷代主人について:建陽余氏刻書活動研究(1)附『書林余氏重修宗譜』「書坊文興公派下世系」第 37 世までの翻刻と校訂》,《中国古典小説研究》第 19 号(2015 年),第 21—54 页;陈旭东:《明末清初建阳刻书家余应虬生平述略》,《新世纪图书馆》2022 年第 3 期,第 60—65 页。

②熊人霖:《书林荐举余犹龙墓志铭》,《鹤台先生熊山文选》卷十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刻本(索书号:314-0089),叶一至三。

③熊人霖:《书林荐举余犹龙墓志铭》,《鹤台先生熊山文选》卷十三,叶二。

④“同文书院在崇化里,宋乾道间朱文公建,以贮图书,特祀孔子于中,后遭兵燹,元大德丁未,泉州总管府推官张光祖重建,岁久倾圮。万历癸巳,长乐陈公省倡议重建,时知县赵子贞始其事,至丁酉,知县魏时应成之。书院原未立田,万历丁酉,知县魏时应以其地方业儒者少,特捐俸三十两,令书户余彰德买田一十五箩,给生员熊体信掌理。递年收租,扣纳条鞭外留给生儒书灯之资。”(杨德政等纂:《建阳县志》卷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序刊万历间补刻本,索书号:WA35-47),叶十四。

⑤熊人霖《重修书林同文书院记》曰:“今兹之有□于书院也,余子应虬、郑子以初实经理之,吾宗文学熊飞、志学、九岳、九敕,暨诸君之裔余昌年、元熹、元焘、震、晋,郑祖玄,熊师文实左右焉。”(熊人霖:《鹤台先生熊山文选》卷二,叶十七)。按,余昌年为余应虬次子,余震、余晋为应虬孙;余元熹、余元焘为余应良孙。

余姚人,万历八年进士①。李槃聪颖博学,于六经子史、风角占候无所不通,也极好教导弟子、提携后进:“理承天六载,治狱多平反,两司分校,得樊玉衡、彭遵古、彭好古辈十余人,后皆为名臣。以忤直指使者旨引疾归,与太史张元忭讲学于紫阳、阳明二书院……谪山西盂县尉,巡使者闻槃名,征至河东校诸生,得曹于汴、张应微卷,曰:‘二生皆掇解才也。’后于汴、应微相继冠贤书。先是,楚诸生孙大壮、欧阳东凤试于学使者,遗其名,槃白学使者曰:‘二生必隽,宜令应试。’”②而所谓“忤直指使者”,实际上是由于李槃作为承天府推官“多用朱笔添改诸生文字”③,“侵各试官权,多取中诸生”④,为巡按御史弹劾,可见其热衷教导提携学生以至于自隳官守。万历二十年以后,李槃再未出仕,以教学、著书为业。其门人曹于汴称:

> 我师大兰夫子……其平生著书辅翼圣朝设科求士之法,深叹聪明小子未读中国圣经全书,而多读异端外夷之书,误视天地万物……我师忧之,于是类编《六经便蒙全文》,令门人小子年长而识定者,附以旧注新解,使各遍览,以正其志。又编《世史便蒙全集》……我师之书,不为世儒高奇迂阔道学之书,而为制科举业,平常达道,得志可以泽加于民,不得志可以修身见于世之学。故言言珙璧,种种竞传。近刻《礼记分章庭授新意》,人争购览,立令纸贵,而别有《武德全书》,自万历丁亥(引者按,万历十五年)始行徽歙,天下竞买,不知几千百万,至今已番刊旧本者三矣。昨《孔孟类编》,刊于南康星子,而购览转行,无虑千亿。何啻士人受益,即书商受赐,亦无算也。今《经史编》行,朝发户庭,夕遍海隅,苟志于学,谁能舍之,岂止千百万哉。

①李槃事迹,详参裴喆:《明代戏曲家李槃考》,《中华戏曲》第45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第101—114页。

②张三异修,王嗣皋纂:《绍兴府志》卷四七,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索书号:05183),叶十六。

③《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三年十月庚午”载:“湖广巡按御史任养心疏参考试官承天府推官李槃多用朱笔添改诸生文字,翰林院简讨张应元、礼部员外郎李同芳失于觉察,槃降杂职调边方用,应元及同芳夺俸半年。”(《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七,《明实录》第54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027页)

④“九月,湖广巡按御史论同考推官李槃侵各试官权,多取中诸生,而李同芳故庇之,不行裁阻,得旨,槃降级,同芳罚俸三月。”(陈建辑、沈国元订:《皇明从信录》卷三五,天津图书馆藏明刻本,索书号:9924,叶二十四)

所谓义利两得,人己俱便。阴积淑世之功德,阳享兼人之富厚者。①

根据曹氏所言可知,李槃所著之书多为服务于科举的参考书,在市场上颇受欢迎,吸引了各地书坊刊刻,而他的门人弟子也参与了编纂——李槃将指导学生编纂参考书作为日常学习的训练与润染心志的实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槃及其门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参考书编辑团队,老师总体布局,把握思想大旨,交由学生落实细节,这可能也是李槃得以编纂各种大部头"类编""全书""全集"的原因。《新刻世史类编》应该也是如此,该书有十余位门人署名参阅,书前书后也有多位弟子撰写序跋,详细发明李槃著书之意,可见学生是其一大助力。不过有机会署名者主要是门人中有进士、解元头衔的佼佼者,恐怕他们身后还有不少无名弟子,以编书作为学习过程。

《新刻世史类编》中,余彰德作为梓行者署名,其子余应虬与孙余昌祚②则同李槃子嗣、弟子一道署名为参阅者,二人所撰引言称:"小子游先生之门墙有日矣,癸卯(引者按,万历三十一年)冬获见先生手编,请寿诸梓,以公海内。至丙午(引者按,万历三十四年)春始得毕业,适先生长公至,聿观厥成……则余小子实在下风,曷敢赞一词耶。"③二人究竟是真曾受教于李槃,还是仅为应酬之语,不得而知,但此书的编辑确实由李槃主

①曹于汴:《李师五经世史便蒙引》,《新刻世史类编》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书林余彰德刻本(索书号:08816),叶一至四。

②上原究一考证,建阳余氏第三十六世之余昌祚为余应良之子,与以"直方堂"名义刻书的新安余懋学之子余昌祚并非同一人,详参[日]上原究一:《萃慶堂の歴代主人について:建陽余氏刻書活動研究(1)　附『書林余氏重修宗譜』「書坊文興公派下世系」第 37 世までの翻刻と校訂》,《中国古典小説研究》第 19 号(2015 年),第 49—50 页。

③《世史类编引》,《新刻世史类编》卷末,叶三至四。上引熊人霖《书林荐举余犹龙墓志铭》称余应虬"肄业南雍,文名噪白下";余应虬所刊另一书《鼎镌徐笔洞增补睡庵汤太史四书脉讲意》序言亦提及"予不敏,就业成均……客岁归自金陵,取道西江,谒徐君笔峒,谋所以重镌之"(余应虬:《题增补四书脉序》,《鼎镌徐笔洞增补睡庵汤太史四书脉讲意》卷首,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序刊本,索书号:277-0108,叶一至三),则应虬似经常活动于金陵。江南一带为文人聚集地,稿源丰富,余氏与此地文人应有较多接触,自然有机会结识以著书知名的李槃并与之合作。余氏称《新刻世史类编》刻成之时"适先生长公至,聿观厥成",或许李槃长子也承担了一定联络事务。

导,出版者萃庆堂在内容上未做过多干预,这一点从《新刻世史类编》中李槃的“自家风格”颇为鲜明亦可看出。

书中采用不少李氏先祖李纯卿的成果,如附载书前与插入书中的史论、评语;李槃对许多问题的关注与评论基调也有明显的家学渊源,如在正统观上与主流相悖,以后唐、南唐承李唐之正朔,强调庙祀而非血缘对于正统的意义①。《新刻世史类编》更多、更详细地收录后唐史事,如其他“纲鉴”于《后唐纪》大都始于李存勖称帝之年,而《新刻世史类编》将此前事也收入其中②。此外,不同于其他“纲鉴”袭用常见的图、谱、表、歌,《新刻世史类编》明显增加了更多原创内容,即使有所承袭也进行了细致加工,如“历代帝王传授之图”增加了大量注文,并展现三唐之统绪相承。而在书籍内容以外,门生的序跋极力突显李槃硕儒名师的形象,与遥不可及的“名公”不同,这位“大兰先生”近在眼前,真实无虚,弟子周之锦甚至在跋语中为老师召唤潜在的生徒,称:“复念远方有朋,未得共游门墙,直是蹉过一生,附跋数言,告我同志,如不我弃,我师近尚旅栖越城,课子受徒无虚日,倘亦负笈及门乎?不佞且拥簪而请随切劘之后矣。”③

与自新斋“标题策论纲鉴”重视应试、双峰堂“历史大方纲鉴”标榜名公相比,萃庆堂的“世史类编”对于市场流行热点的迎合度相对较低,这一点从其在书名上刻意避开“纲鉴”二字也有所体现。不过这并不意味此书商业性弱,相反,与文人合作出版编者面目鲜明、有一定个性的“纲鉴”,正是萃庆堂的市场策略。通过与李槃这样有声望且富有商业出版经验的儒师合作,萃庆堂出版的《新刻世史类编》一方面保持着“纲鉴”类参考书的主体内容——这种内容与形式已经过市场认可;另一方面注意融合转化李槃的家学传承与教学经验,并刻意与坊间主流拉开距离,以达

①详参王澎:《“义利两得”:〈新刻世史类编〉的纂修与回响》,《中华文史论丛》2024年第3期,第331—359页。

②《新刻世史类编》卷三三,叶一至十一。其余史文大多同于“历史大方纲鉴”,仅在部分注释和评论上略有增删,并对引用形式做出调整,如“历史大方纲鉴”对于尹起莘《资治通鉴纲目发明》的引用有时接在史文后称“发明”,有时则归入评论,标为“尹氏曰”“尹遂昌”,《新刻世史类编》则统一至史文后称“发明”。

③周之锦:《圣纪世史便蒙类编后跋》,《新刻世史类编》卷末,叶八十七。按,周之锦言“我师近尚旅栖越城”,似乎李槃讲学地点并不固定,曹于汴《上李大兰先生四首》亦言“夫子起南国,开蒙麈辙环”(曹于汴:《仰节堂集》卷十二,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清康熙二年[1663]弘运书院刊本,索书号:402.6 12892,叶十二),可为佐证。

到标新立异的目的。尽管《新刻世史类编》中的不少观点受到读者批评拒斥①,但反过来也说明该书在吸引读者上是成功的。同自新斋与双峰堂出版的“纲鉴”一样,萃庆堂《新刻世史类编》也有翻刻、续补②,产生了较大影响。

余论:书坊运营与文献特点之形成

如上所述,在“纲鉴”类书籍的发展中,建阳余氏书坊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当“纲鉴”在晚明书籍市场上初露头角之时,曾出版过《节要》的余氏自新斋就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最新市场动向,开始尝试制作“纲鉴”。自新斋以科举应试为卖点,将策题与历史文本结合,同时缩减内容量,最终形成简明扼要的二十卷本“标题论策纲鉴”。该书风靡一时,不仅自新斋及其兄弟书坊屡次出版,别家书坊也有翻版改编。自新斋的尝试大获成功后,同族的双峰堂、萃庆堂也紧随其后加入“纲鉴”的出版。双峰堂推出“历史大方纲鉴”,以集大成的姿态广泛收录名家评论,充实内容,并借助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如李廷机、袁黄、汤宾尹来吸引眼球。萃庆堂则与喜好著书授徒的儒师李槃合作,出版了一部以李氏家学为基础,颇具个人特色的“世史类编”。双峰堂、萃庆堂之“纲鉴”各具特色,质量上乘,同样成为受市场追捧的经典之作。整体来看,建阳余氏书坊得风气之先,制造出多种经典“纲鉴”,成功吸引各地书坊加入“纲鉴”生产,而

①如冯梦龙、王夫之等人曾批判李槃的正统论,详参王澎:《“义利两得”:〈新刻世史类编〉的纂修与回响》,《中华文史论丛》2024年第3期,第357—358页。

②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有署“宾宇张起鹏梓行”的明刻本《新刻世史类编》四十五卷首一卷(索书号:202.1 01821)。此书与萃庆堂本全同,仅在识语、卷首处将余彰德的署名改为张起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重刻详订世史类编》六十一卷首一卷,存卷首至卷四十五(索书号:284-0075),卷端有张起鹏署名,版心刻“毓秀斋重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重刻详订世史类编》六十一卷首一卷(索书号:T/2512/1142),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本内容版式相同但非同板,该书每卷卷端有署名,部分卷端保留了“宾宇张起鹏梓行”,卷二误作“宾宇张起文梓行”,大部分卷端删去张起鹏署名,可能为其他书坊翻刻本。按,毓秀斋张宾宇为崇祯年间活动的杭州书坊主,曾刊《新刻宋文丞相信国公文山先生全集》《新镌穷乡便方》等。详参杨绳信编著:《增订中国版刻综录》,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

“标题论策纲鉴”“历史大方纲鉴”“世史类编”也成为模仿对象，或翻刻、或挪用、或借鉴，衍生出更多“纲鉴”①，形成了庞大的市场与阅读风潮。

建阳余氏家族的“纲鉴”制造每一步都伴随着精明的商业策略，也正是其对生意的经营形塑了“纲鉴”的面貌与特点。余氏作为世代刻书的大家族，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但同样需要不断开拓市场，推出畅销书籍，自新斋从出版《节要》到“标题论策纲鉴”，正是这种需求的体现。尽管有对市场的基本判断，但自新斋依旧十分谨慎，在出版策略上选择紧紧依附于科举，且控制书籍篇幅，减少板木与纸张数量从而节约成本。自新斋的尝试成功后，同族其他书坊也迅速跟进，双峰堂、萃庆堂各自推出卖点不同的“历史大方纲鉴”与“世史类编”，既是为了占据市场，开辟自己的领地，也是为了避免商品雷同，干扰族人生意。在确认“纲鉴”类书籍受市场欢迎后，两家书坊不再像自新斋那样保守，出版的“纲鉴”不仅卷数明显增多，且尝试提升书籍品位。可以说，正是各家书坊的不同发展策略催生出这些性质相同但又各具特色的“纲鉴”。

余氏书坊主们不仅在出版前有明确策略，在制造出经典畅销书后，也注意其维护与更新。根据现存刻本，自新斋及其兄弟书坊三次刊刻“标题论策纲鉴”，间隔时间分别是六年与七年；余象斗三次刊刻“历史大方纲鉴”，间隔时间是十年②。商业出版书籍的刷印相对更重视印量而非板木保存，有学者指出，雕板在高强度刷印下寿命大约是五到八年③，这与余氏书坊再次刊刻的周期非常吻合，或许诸家书坊再度刊刻的契机正是书板寿命已至。值得注意的是，自新斋与双峰堂每次刊刻都在前一版基础上做出或大或小的更新，并改换书名、署名者。没有原样翻刻而是增补修订，及时跟上市场动态，甩掉模仿者，这是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

①如《纲鉴统一》三十九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索书号：SB/910.9/3140）、《鼎镌钟伯敬订正资治纲鉴正史大全》七十四卷首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清初印本，索书号：SB/910.9/8296修）、《梦松轩订正纲鉴玉衡》七十二卷首一卷（日本蓬左文库藏明崇祯十年[1637]刻本，索书号：56-43）等等。

②如前所述，《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亦可算作“历史大方纲鉴”系列之一，该书刊于万历末年，与《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也相隔十年左右。

③详参何朝晖：《试论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及相关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8—30页。

持优势的方法，体现出对自家书坊畅销书的经营意识。这种“更新式再版”带来了复杂的书籍情况，模糊了书籍间的界限，如从万历十四年的《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到万历二十年的《新刊补遗标题论策纲鉴全备精要》，增改内容较少，完全可以视作同一种书；而从万历二十八年的《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到万历三十八年的《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增补则相对多一些；再到万历末以“三台馆”名义出版的《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大幅增改的同时另起标题，面目颇有不同。

在市场竞争之外，也存在与其他书坊的合作。建阳的刻书家族之间多为姻亲，如余氏与熊氏、刘氏、陈氏、郑氏、叶氏、詹氏、黄氏等刻书家族均有频繁联姻，彼此间既是商业对手，也是合作伙伴。以熊氏为例，余象斗、余彰德父辈（33 世）至其孙辈（36 世）有婚姻记载的 29 人中，与熊氏联姻者有 4 人，数量最多①。熊氏一族的文人熊明遇、熊人霖受余应虬邀请坐馆讲学，教授子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余氏刻书，熊人霖还为余应虬撰写墓志铭②，可见这一时期两家关系较为亲密。万历四十年熊氏种德堂出版《镌紫溪苏先生会纂历朝纪要旨南纲鉴》，即以余氏万历二十年本“标题策论纲鉴”为蓝本。在建阳之外，跨地域的合作也较为普遍。畅销书籍诞生后，倘若全国市场需求大于一副雕版的印刷产量，那么与异地书坊合作分享市场，允许其翻刻销售，以换取他日翻刻对方畅销书的权益，无疑是明智的策略。已有学者指出，建阳余氏与金陵唐氏、周氏的书坊有

①此据上原究一整理校订的《书林余氏重修宗谱》统计。详参［日］上原究一：《萃慶堂の歴代主人について：建陽余氏刻書活動研究（1）　附『書林余氏重修宗譜』「書坊文興公派下世系」第 37 世までの翻刻と校訂》，《中国古典小説研究》第 19 号（2015 年），第 25—32 页。

②“及先宫保偕余侨寓厥里，公又率里之父老延先宫保讲大义于书院，而书院之右即公所筑高山堂也。馆余而设皋比，朝夕训率其里之子弟焉……未几，余亦归书林侍养，每行游里外，髦稚见余辄曰：此馆余犹龙家者先生也。”（熊人霖：《书林荐举余犹龙墓志铭》，《鹤台先生熊山文选》，叶二至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明崇祯印本《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索书号：284-0031）有熊明遇序，从题衔看应为崇祯时作；内封署名“熊良孺先生重订”“余伯玉梓行”。余伯玉不详何人，或为象斗后人，因该书受欢迎而继续刷印出版，邀请熊明遇作序。

合作关系,并认为这种跨地域的书坊合作是值得注意的研究方向①。金陵周时泰翻刻《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通鉴》②,金陵叶应祖聚星馆翻刻《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③,杭州张起鹏毓秀斋、金陵晏少溪④翻刻《新刻世史类编》,张起鹏后又刊刻《新刻世史类编》增补本《重刻详订世史类编》,有可能也是类似的跨地域书坊合作。当然,书坊的擅自翻刻与改编也广泛存在,而书坊合作往往也不会在书中明确说明,故而二者有时难以分清。

建阳余氏与"纲鉴"出版的例子,有助我们从书坊经营的视角理解晚明商业出版书籍的文献特点。一是书籍间主题、性质相似,但在细节处又多有创新,前者是市场驱动下书坊追逐热点的产物,后者则是书坊应对竞争采取差异化策略的结果。书坊各显神通的创新推动了书籍在内容与形式上的进步,更好地契合读者需求。二是书籍不断更新并具有流动性。一方面,书坊为了适应市场变化而不断对自家书籍做"更新式再版",书名、署名与内容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书坊间的合作与跟风也推动书籍的改编与衍生。书坊的商业经营策略对所出版书籍的文献特征有重要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索。

【作者简介】李卉,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献文化史。

①[日]上原究一:《明末の商業出版における異姓書坊間の廣域的連携の存在について》,《東方學》第131辑(2016年),第52—70页。

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新刻校正古本历史大方通鉴》四十一卷(索书号:TB367/2608)。该书卷首署"太学绣谷敬竹周时泰刊行"。

③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鉴补》三十九卷卷首一卷(索书号:2012402750)。该书卷首署"潭阳叶应祖刊行",卷末牌记"万历庚戌仲冬月聚星馆叶氏梓行",系照式翻刻余氏牌记,将"双峰堂余氏"改作"聚星馆叶氏"。按,叶应祖为金陵书坊主,曾刊《王伯穀全集》。卷首署名之"潭阳"或为其祖籍,亦有可能是原刊本中"潭阳余象斗刊行"仅修改了姓名后的残留。

④《增订中国版刻综录》著录"书林晏少溪刊《新刻世史类编》四十五卷首一卷　明李纯卿草创谢迁补遗王守仁覆详王世贞会纂李槃增修"(杨绳信编著:《增订中国版刻综录》,第323页)。